

一别多年，归来已是忠魂

——6位归国志愿军烈士的家国故事

清明 特别策划

又是一年春草绿，
又是一年清明时。此刻，我们来追忆6位志愿军烈士，周少武、侯永信、冉绪碧、陈曾吉、许玉忠、方洪有。

去年，有关部门在599位归国志愿军烈士的上千件遗物中，以24枚刻有个人名字的印章为线索，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DNA检测等方式，最终确认了这6位烈士的身份，得以让他们在阔别半个多世纪后，与家人“团聚”。

只是，时光，已经过去70年。他们牺牲时，没有一个人留下后代，他们的生前事，已经知者寥寥，在家中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晚辈的讲述中，那些模糊的记忆碎片，很难拼出一个个完整鲜活的人生。

所以，这里记录下的故事，不离奇，不曲折，或许，也不生动。但我们还是想如实地呈现给读者，因为，这6位烈士的身后，还有那些即使回到祖国怀抱却仍没有找到家人的593位无名英烈，以及那些至今仍长眠在异国他乡的烈骨忠魂。这些几经转述的“碎片”，不仅仅是一个个家族的记忆，更是一次穿越时光的回望，可以帮我们勾勒出那段烽火岁月在一代热血青年身上烙下的时代印记，让我们感悟他们在“舍与得”抉择中映照出的家国情怀。

“煌煌烈士尽忠臣，不灭光辉不朽身”。谨以此文，致敬那些在异国他乡为国捐躯的志愿军烈士。

——编者

寻找，为了忠魂的安息

图案，上下两边印有坦克、飞机。

这是烈士周少武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周少武的弟弟周观富已于2014年去世，周观富的孙子周波说，从小他便经常听爷爷讲大爷爷的故事。爷爷告诉他，两兄弟从小相依为命，后来一起逃荒到陕西，在那里，年仅17岁的周少武参军入伍。自此，周观富就再也没有哥哥的消息。后来，他回到老家河南济源，一直四处打听，却始终杳无音信。直到他收到这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才知道哥哥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周观富一直把这张证明书视若珍宝，后来还专门到镇上请人做了一个玻璃镜框把它装裱起来。

过去几十年，周观富从未放弃过寻找哥哥的遗骸，他一直惦记着把哥哥周少武接回家，但直到2014年他离世时也未能如愿。

就在周观富去世不久，长眠异国多年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开始分批次回国，第一批回国的烈士遗骸中就有周少武。

可惜，周观富未能在生前得知这一消息。

烈士侯永信，1920年出生在辽宁省灯塔市柳河子镇上柳河子村，参军后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系。1952年，家人在他牺牲1年后，收到了他的阵亡通知书。此后，他的家人在村子的墓园里，为他垒起一处衣冠冢，立起一块无字墓碑。每年清明，家人都会去祭扫。

去年9月，侯永信的侄子侯甫元和侄女侯甫兰、侯甫坤作为受邀烈属代表，赶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参加烈士认亲仪式。他们仰望着陵园里的英名墙，看到了“侯永信”3个字，泪流满面。

今年清明节前夕，“烈士侯永信之墓”7个大字，终于刻在那块无字墓碑上。从看到那张阵亡通知书，到把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侯永信的家人，等了整整68年。

陈曾吉随部队入朝作战。那年7月，身为班长的陈曾吉在朝鲜江原道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0岁。家人得知这一消息，收到陈曾吉的烈士证时，已是1955年。和烈士证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张陈曾吉的军装照片，这也是他留下来的唯一影像。

陈曾吉的母亲黄凤金在临终前把照片交给二儿子陈寿山保管。如今，在陈寿山家中，这张军装照依然摆在屋内。

“后来，陈曾吉的3个兄弟都曾报名参军。”陈寿山的妻子金春今说，大哥牺牲后，丈夫和两个小叔子也相继报名参军。乡政府考虑到要给陈家留下一个劳动力，没有批准陈寿山入伍。陈虎山、陈虎吉两兄弟则如愿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父辈们踊跃参军、保家卫国的感召下，陈家后代也不甘落后，陈寿山的两个儿子和陈虎山的两儿一女，也相继参军报国。

他的脑海里。方洪启兄弟俩自幼父母双亡，相依为命，靠讨饭和卖苦力长大。1949年4月，当涂县解放，兄弟俩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父亲告诉方直文，当时弟弟方洪有要去参军，他大力支持。

另一个“春天”，是去年春天。方直文的二女儿方娟在网上看到了“寻找英雄”活动中24位归国志愿军烈士的名单，留言“方洪有就是我的小爷爷”。经过确认，他们寻亲成功。回想起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英名墙上摸到叔叔“方洪有”的名字，方直文眼眶发红：“多少年了，父亲在清明时都不忘为叔叔烧一把纸”。

最美人间四月天。4月的中国，草长莺飞，姹紫嫣红，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无数像周少武、侯永信、冉绪碧、陈曾吉、许玉忠、方洪有这样的英烈，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才迎来一个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谭长俊、丁宏旺、黄子岳、赵程彰、张建平、李军、黄韧、白亚东、本报特约记者朱勇、屈雷宇采写）

烈士冉绪碧和陈曾吉的家人是幸运的，他们珍藏着烈士留下的遗物，可以睹物思人，寄托哀思。

一个木制算盘，一盏桐油灯，一个简易木制书籍，3件由家人捐赠的冉绪碧烈士的遗物，如今静静地“躺”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的展柜中。

家住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龙兴村的冉方章，是冉绪碧的侄子。“家里老人都说，如果叔叔活着，一定是最有文化的人。爷爷早就有交代，一定要保管好叔叔的这3件遗物。”冉方章说，听父辈讲，叔叔冉绪碧从小就展现出很高的天资和学习热情。为支持他读书，

在那个节衣缩食的年代，爷爷冉启基只好让其他3个孩子辍学，全力供小儿子冉绪碧读到了五年级，并为他购置了学算数用的算盘。为了读书，冉绪碧早出晚归，每天都要跋涉四五里山路。为了让冉绪碧好好学习，冉启基还咬牙用12斤玉米换了一盏桐油灯，供冉绪碧晚上学习使用。

渐渐地，私塾教育已经满足不了冉绪碧对知识的渴望。冉启基又用60斤玉米当学费为冉绪碧请了一位教书先生。为了便于保存学习书籍和用品，冉启基特意请木匠师傅为小儿子手工制作了一个书籍。

珍藏，为了思念的安放

更多的时候，这几位烈士，“活”在家人和亲友的回忆中。

去年9月，许玉忠烈士的两个侄子许同海、许同桥从河北老家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参加烈士认亲仪式。临行前，村里的乡亲来送行，他们交代许同海带上家乡的小枣、花生和苹果，“让‘玉忠’尝尝老家的东西”。1948年，许玉忠就是吃着老家的小枣、花生参军的。

今年65岁的许同海介绍，许玉忠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三，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已去世。虽然没见过三伯，但许同海觉得他并不陌生，知道他参加过哪些战役，在战斗中如何英勇杀敌。

许玉忠的家中有一张留存了71年的立功喜报，虽然已有些残缺，但上面

的字迹依然清晰：青仓县七区赵官村许玉忠同志在秦岭战役中建立了“英勇追敌不怕困难完成任务”三等功绩。上世纪50年代，政府部门告知许玉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后来将烈士证、烈属牌和抚恤金等送到家中。“之后有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同乡告诉家里人，三伯牺牲在朝鲜，是他亲眼所见。”那位同乡回忆，当时部队组成了一支突击队，向敌人的一高地发起攻击。战斗开始前，已是副班长的许玉忠向其他战友高喊了一声“来世再见吧”，就带领全班战士冲了上去。

1991年，许家重修家谱。虽然许玉忠没有子嗣，当时也不知长眠何处，许同海依旧将三伯的家谱续上。他坚信，有一天三伯会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父亲去世两年后，我们终于按照老人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的老部队“甘巴拉英雄雷达站”。

2006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晚。当父亲看到“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官兵向全国人民拜年的镜头后，又一次忍不住念起自己对老部队、对西藏的思念。父亲一直想找机会回老部队看看，无奈因为身体不适无法成行。了解父亲心愿的哥哥在一旁说：“爸，你放心吧，生前我们不能陪你回西藏，以后我们一定会带你的骨灰回去一趟。”父亲听后，并没有因为哥哥在新年里说这些生前身后事责怪他，反而兴奋地满口应下：“带去就不要带回来，找个山头，撒了、埋了都行，雷达兵就是要‘占山为王’的。”

2013年夏天，趁着孩子放暑假，我们兄弟两家人陪同母亲共7人，带着父亲的骨灰驱车近4000公里，重走他当年的进藏路，前往父亲生前的老部队。

一路向西，车过西宁。山，绵延不尽的山。戈壁，广袤无垠的戈壁。很长一段时间，车窗外的风景没什么变化，只是相似的画面不停地在倒退。刹那间，时光也仿佛在倒流，我不禁想起了父亲。58年前，他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从江南水乡来到青藏高原，会想到将在西藏服役20年吗？会想到他将与未来的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吗？会想到他既无法见证两个儿子的出生，也无法在父母弥留之际于身边

尽孝吗？我不知道答案。父亲在世时，喜欢和我们聊起他的军旅生涯，时常有些豪言壮语，但很少说起内心的感受。

父亲是1962年第一批进藏的雷达兵，1982年转业回到内地。他把20年的青春奉献给了部队，献给了雪域高原。20年间，他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副团长，艰苦的工作环境却从未改变。雷达站一般都部署在“一览众山小”的高地上，也就是父亲口中常说的“占山为王”。然而，雪域高原的“高地”，又是何其荒凉。

父亲常年在西藏服役，一年半到两年才能休一次假，交通也不如现在便利，回家一次单程也要四五天。奶奶去世时，母亲连续给父亲拍了6份电报。第一份是“母病危速归”，第二份是“母泪盼儿归”……可每份电报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万般无奈，家人找来一个身材与父亲相似的亲戚，穿上军装来到奶奶床前，握着她的手说：“娘，您的小儿子我回来了……”奶奶听完这句话，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父亲终于赶回家时，奶奶已经去世36天了。1977年夏天，爷爷去世时，父亲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训练会议，又一次未能最后在床前尽孝。

我是1岁多时才见到父亲第一面，哥哥是直到3岁还不认识父亲。父亲休假回家，母亲要哥哥过来叫爸爸，可

他始终不肯，躲在母亲怀里，怯生生地望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人，小声地说：“那不是我爸爸！”母亲和在场的邻居都流下眼泪。

转业后，父亲一直还想回老部队去看看，在北京参观展览时都会因为和布达拉宫模型合了张影而兴奋半天。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他一直未能成行。1999年退休后，父亲开始积极锻炼身体，为回西藏做准备。不幸的是，长期的高原生活给他的身体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2000年夏天，父亲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肌梗塞。1年后，哥哥带着父母去了成都，父亲在这里重游了许多故地，再次燃起了去西藏的希望，但他大病初愈，依旧未能如愿。之后他在家中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返藏的希望彻底破灭。从此，父亲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有关西藏的消息，尤其是每年的央视春晚，只要一出现甘巴拉雷达站官兵拜年的画面，父亲就会神采飞扬，不停地说：“这个阵地就是当年我们去勘察的，现在条件好了，这房子、这条路应该都是这几年刚修的……”

2011年9月，父亲溘然长逝。他走了，但他的心愿一直搁在我们所有家人心里，不管多远，我们都要把他送回甘巴拉，让老兵归队。

带着父亲的骨灰，我们一行人终于来到父亲的老部队。对于父亲的遗愿，老部队的团首长和政治处领导给予大

力支持，建议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他魂牵梦萦的雷达站前的山坡上。

西藏的天，纯净、湛蓝、深邃、高远。海拔5374米，背靠着父亲参加选址、建设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左望滔滔的雅鲁藏布江，右观柔美的羊卓雍措，我们和战士们共同堆起玛尼堆，洁白的哈达寄托着我们的哀思。

生前最后几年，父亲时时挂念着这片神奇的土地。现在，他终于留在了这里，守着心爱的雷达站，有战友们陪伴，静静地看着祖国的壮丽山河，再回“吹角连营”。

（尚宗昌、杨进整理）
本版制图：张锐

五三七四，老兵“归队”

■ 张民

